

古籍考辨叢刊

第一集

古 籍 考 辨 叢 刊

第 一 集

顧 頤 剛 主 編

中 華 書 局 出 版

內 容 提 要

本叢刊收集我國前代學者考辨古書古史的材料真僞、時代先後的重要論著，系統編輯，分集刊行。第一集收通論四種，經學三種，子學三種，共十種。爲便於研究參考，經校勘標點後，彙訂成一冊出版。

編號：26554

古 籍 考 辨 叢 刊 (第一集)

定價(7)三元九角八分

主編者：顧 頡 剛
出版者：中華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東總布胡同五七號
印刷者：華 成 印 刷 所
上海華興路五二三弄十四號
總經售：新 華 書 店

55.11, 滬型, 434頁, 欄4頁, 413千字, 850×1168, 1/32開, 27--1/8印張
1955年11月第一版上海第一次印刷 印數[滬]1—2,500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〇一七號)

古籍考辨叢刊第一集目錄

書名	著者	輯校點者	總頁數
序	顧頤剛		(一一一〇)
唐人辨僞集語		張西堂輯點	(一一一九六)
朱熹辨僞書語		白壽彝輯點	(九七一—一九〇)
四部正譌	明胡應麟著	顧頤剛校點	(一九一一—二五二)
古今僞書考	清姚際恆著	顧頤剛校點	(二五三—三三二)
以上通論四種			
詩疑	宋王柏著	顧頤剛校點	(三三三—四〇三)
書序辨		顧頤剛輯點	(四〇五—五二四)
左氏春秋考證	清劉逢祿著	顧頤剛校點	(五二五—六六五)
以上經學三種			

論語辨

趙貞信輯點

(六六七—七六八)

子略(選錄)

宋高似孫著

顧頤剛校點

(七六九—七八四)

諸子辨

明宋濂著

顧頤剛校點

(七八五—八二三)

以上子學三種

後記

顧頤剛

(八二三—八四二)

序

『考據學』是一門中國土生土長的學問，它的工作範圍有廣、狹二義：廣義的包括音韻、文字、訓詁、版本、校勘諸學；狹義的是專指考訂歷史事實的然否和書籍記載的真偽和時代。總之，它以書籍為主體，要徹底弄明白許多書籍的文字意義和社會意義，來幫助人們瞭解歷史。到了現在，考據學這個名詞應當改稱為『史料學』。史料學的目的，是從資料的來源和它的真確性以及作者的時代和他的環境等問題來揭示出每一件資料的本質，認定它是一定的社會環境下的產物，以便人們根據了這樣的分析，進一步綜合某一時代的資料而得着正確的歷史知識。可是這個工作現在還沒有達到讓我們可以隨意應用的高度。郭沫若先生說：『無論作任何研究，材料的鑑別是最必要的基礎階段。材料不夠固然大成問題，而材料的真偽或時代性如未規定清楚，那比缺乏材料還更加危險。因為材料缺乏，頂多得不出結論而已，而材料不正確便會得出錯誤的結論。這樣的結論比沒有更要有害』。又說：『研究中國古代，大家所最感受着痛苦的，是僅有的一些材料却都是真偽難分，時代混沌，不能作為真正的科學研究的素材』。（十批判書，頁二。）這真是郭先生在研究工作上的甘苦有得之言，他所感到的痛苦就是我們讀古書的人共同感到的痛苦。

遠在二千四百年前，孔子的弟子子貢已經覺出周王朝歪曲了被征服的商王朝的歷史所作的惡意

宣傳，他感慨地說：『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論語子張。）過了百餘年，孟子也看出了周王朝宣傳自己的武功過分超越了實際，又歎息道：『盡信書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孟子盡心。）這都是對於當時統治集團太過提高自身和故意壓低對方的非歷史主義的批評。又過了一百年，韓非感到那些獨樹一幟的家派都把自己的主張說成了古聖先王的言行，混亂了時代，誣蔑了古人，起來詰問道：『孔子、墨子俱道堯、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謂真堯、舜。堯、舜不復生，將誰使定儒、墨之誠乎？』（韓非子顯學。）又過了一百年，劉安們看清楚了游談之士僞託古人以自重的技倆，把當時情形明白地寫出：『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賤今，故爲道者必託之於神農、黃帝而後能入說。亂世闇主高遠其所從來，因而貴之。爲學者蔽於論而尊其所聞，相與危坐而聽之，正領而誦之』。又道：『今取新聖人書，名之孔、墨，則弟子句指而受者必衆矣』。（淮南子修務。）明明是『新聖人』，却說是古聖人，爲的是容易動聽，得以吸引人們的信仰，也可希望統治者替他實現所策畫的政治方案。所以，古書中有僞書，真書中有僞事，這是明顯到無法迴護的事情。

可是上面所舉的子貢、孟子、韓非、劉安四人的話，目光雖甚銳利，只是考據學尙未成立時的一種直覺，並沒有經過深刻的查考。至於切切實實做研究工作，要徹底看出古書的真相的，那必須待至古書已成爲研究對象的時候起。就我所見，大約公元第二世紀馬融所作的一篇否定尚書泰誓的

文字可算做考據性的辨僞的第一聲。他說：「秦誓後得，案其文似若淺露。又云：「八百諸侯不召自來，不期同時，不謀同辭」，及「火復于上，至于王屋，流爲陂。五至，以穀俱來，舉火」。神怪，得無在子所不語中乎！又春秋引秦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國語引秦誓曰：「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孟子引秦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取彼凶殘，我伐用張，于湯有光」。孫卿引秦誓曰：「獨夫受」。禮記引秦誓曰：「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今文秦誓皆無此語。吾見書傳多矣，所引秦誓而不在秦誓者甚多，弗復悉記；略舉五事以明之，亦可知矣」。（尚書注疏卷十引。）秦誓是漢武帝時所謂新發見的一篇周初的書，當時立於學官，取得國定本教科書的地位。但它在經典上的權威竟不能鼓起馬融的信仰，反給他舉出兩項理由來反對：第一，其中太多神話，不合於孔子選尚書的標準；第二，古書中所引的秦誓都不曾見於這一篇裏。前一項理由很有商量的餘地，因為古人本來相信神話（實際上這是秦、漢間人派定周爲火德，故有「火復于上」及「舉火」的符瑞）；後面一項卻是顛撲不破的堅強證據。左傳、國語、孟子、荀子、禮記都是孔子以後的書，如果尚書百篇確出孔子所定，武帝時發見的秦誓又確爲其中的一篇，那麼左丘明、孟軻、荀卿等所引的秦誓之文便不該不在裏頭，爲什麼在這一本中都看不見？這本秦誓的文字，爲什麼又絕不見引於先秦諸子？這分明是兩篇文章，一篇是戰國時存在着的，一篇是西漢時僞造的。

自從隋、唐間佛經有了雕板，五代時推廣到儒書，刻了九經和文選等書，北宋時又刻了十五史和諸子等書，學者讀書方便，聞見容易擴大，取證自然豐富；又受了禪宗的『呵佛罵祖』的影響，敢對學術界的權威人物和經典著作懷疑。唐代的疑古者以劉知幾和啖助爲巨擘和先導；宋代則歐陽修、程頤等倡之於前，朱熹、程大昌、王應麟等繼起於後；他們在古書範圍內提出的問題愈來愈多，關於古帝王和聖人在道統說上發生大作用的書，像古文尚書、春秋左氏傳、孝經、易傳、詩序、書序、孔子家語、孔叢子等等一個接着一個地受到了檢舉，每一問題因討論之多而理由日益充足，考據學就漸漸地成立了起來。不過當時提出的問題雖多，方法和研究工作還是粗枝大葉的，所以穀不上徹底解決問題。

到了清代，學者們的工作方法愈來愈細密，討論的問題雖不太多，然而所討論的問題總是接近於解決的地步。現在，我舉出三件事情，可以作爲清代學術的主要收穫的來說。

第一，十七世紀的末年，閻若璩用了一生精力寫出尚書古文疏證一百二十八篇，把晚出的古文尚書的來源一一尋出，又把僞作者鈔襲古書而鈔錯了的地方也一一揭破，還把所謂古文尚書裏的政治制度、歷史事實、曆法、地理、文法的不合於古代實際的以及它和古本尚書、漢代經師解釋不合的地方也都一齊檢舉，暴露了它的種種內在的矛盾。他的這般比較圓滿的理論漸漸取得了學術界的公認，雖有毛奇齡等幾個人用了大氣力來翻案，大家只是一笑置之，發生不出什麼影響。但是這部

古文尚書究竟是誰偽作的呢，他還沒有能決定，這個問題留待一百年後的丁晏作了一部尚書餘論，纔指實是魏代的王肅。古文尚書是封建統治階級所謂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教科書，尤其是『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十六個字是所謂『堯、舜、禹相授之心法』，成爲宋、元、明理學的最神聖的信條的，竟給閻氏摧陷廓清，實在不能不說是學術界中最突出的一件事。這是清代學者對於三國時代的偽書的研究成績。

第二，西漢後期，當漢代經學由極盛而蛻化的時候，驟然出來了許多部古文經，表章這些經的是劉歆和王莽。它的出現或託之孔壁所發，或託之中祕所藏，或託之民間所傳，實在有許多破綻，兩漢學者已很多懷疑；但因當時還沒有精密的考據方法，批評的不得要領。到了清代，爲了崇拜漢學，凡是漢代的每一個大派和每一個名家差不多都有人作專門研究，於是把湮沒了近兩千年的今古文經學的爭論問題重新提出。十九世紀初葉，劉逢祿作左氏春秋考證，從本書的內容和傳授系統上證明左傳和春秋確實是不相干的兩部書，硬被人們湊在一起。到了那世紀的四十至六十年代，魏源作詩古微和書古微，又揭破了毛詩和漢代的古文尚書都是偽古文；邵懿辰作禮經通論，又揭破了逸禮是偽古文。左傳、毛詩、逸禮、古文尚書是漢哀帝時劉歆爭立的四部經典，他的願望到王莽執政而實現，想不到過了一千九百年之後竟一齊被人擊破。再有一種學者是不參加這些論戰而是專門整理今古文問題的資料的，像東漢許慎作五經異義，記錄今古文兩家對於古代政制和禮制的不同

說法，到了十九世紀初葉，陳壽祺作五經異義疏證，就把兩方面的異說加以詳盡的闡明；東漢章帝初年，會諸儒於白虎觀，講議五經同異，班固記錄爲白虎通義一書，到了十九世紀中葉，陳立作白虎通疏證，又把漢人經說悉數編排進去。同時輯佚之學大盛，凡漢代已佚的著作，幾乎全數輯了出來，資料集中，大有助於人們對於那時代的學術作全面的認識。所以到了十九世紀的九十年代，廖平作今古學考和古學考，康有爲作新學僞經考，便把今、古學家的不同面貌和劉歆僞造古文經的一件事實作了整個的批評。最後，崔適作史記探源，揭出史記中涉及古文經的各點也出於後人的竄亂。這個研究工作的發展到現在不過一百五十年，已得着一個大體的認識。由于距離問題發生的時代較遠，許多古代資料已沒法找到，當然不如僞古文尚書問題的可以順利解決。但是有了這許多人的研究在先，將來我們把握了正確的方法和新出的資料（例如魏三體石經），必可比他們再進一步。這是清代學者對於西漢時代的僞書的研究成績。

第三，戰國、秦、漢一段時期的人們最敢大膽說話，他們不根據資料而稱說古代，並把自己的意見亂套在古人頭上；古人的事情就儘跟着他們的每一張嘴而變化；破綻太多了，所以人們就知道『百家言不雅馴』，司馬遷作史記已經大大地費了一番別擇的工夫，然而總是掃除不盡。此後，對於古代，只有人作綜合資料的工作，却沒有人拿了這些資料來作分析和綜合的研究。到了十八世紀的九十年代，崔述發揮了他的極大的勇氣，加上沈潛三十年的功力，作了一部考信錄，把戰國、

秦、漢間所說的上古、夏、商、西周以及孔子、孟子的事情全部考證了一下，結果推翻無數偽史，又系統地說明了無數傳說演變的演變。雖是他牽纏於聖道王功的偶像作用，還不能把這個工作做得徹底，究竟他已經斧鑿開山，後人就他的基業上進展容易了不少。在崔氏同時，梁玉繩作了史記志疑和人表考兩書，對於同馬遷以前的歷史事蹟和人物傳說的發展變化作了一回總清理。把梁、崔二家的書合看，無論是古人有意的造作或是無意的傳說，大致可以把握得住，不必再去盲從。這是清代學者對於戰國、秦、漢間人口頭傳說的歷史作出的研究成績。

從這三件事情說來，清代的考據學的主流無疑是要把從戰國到三國的許多古籍的真偽和它們的著作時代考辨清楚，還給它們一個本來面目。他們的優點是不受傳統的束縛，敢於觸犯當時的『離經叛道、非聖無法』的禁條，來打破封建統治階級爲了自己的利益而歪曲造成的歷史；所用的方法也是接近於科學的。他們的缺點是受了時代的限制，還不能完全擺脫聖道的觀念；所用的方法也有武斷主觀的成分。我們生在他們之後，當然容易接受他們的優點；如能掌握了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的武器，也容易改正他們的缺點。

說到以往的考辨的工作，常常引起一般人的誤會，以爲要把歷代流傳下來的古書和古史一齊推翻。其實完全不是那麼一回事。從前我曾在一篇文字裏說：『許多偽材料，置之於所偽的時代固不合，但置之於偽作的時代則仍是絕好的史料；我們得了這些史料，便可瞭解那個時代的思想和學』

術。例如易傳，放在孔子時代自然錯誤，我們自然稱它爲偽材料；但放在漢初就可見出那時人對於周易的見解及其對於古史的觀念了。又如詩三百篇，齊、魯、韓、毛四家把它講得完全失去了原樣：本是民間的抒情詩，成了這篇美后妃，那篇刺某王，甚至城隅幽會的淫詩也說成了女史形管的大法，在詩經本身上當然毫無價值；可是我們要知道三百篇成爲經典時被一般經師穿上了哪樣的服裝，他們爲什麼要把那些不適合的服裝給它穿上，那麼，四家詩的胡說便是極好的漢代政治思想史料，如何可以丟棄呢？荒謬如讖緯，我們只要善於使用，正是最寶貴的漢代宗教史料。逞口而談古事如諸子，我們只要善於使用，正是最寶貴的戰國社會史料和思想史料。不讀讖緯，對於史書上記載的漢高帝斬白帝子、哀帝再受命、及光武帝以赤伏符受命等事的「天人相與」的背景是決不能明白的。不讀諸子，則對於舜自耕稼陶漁而爲天子、傳說舉於版築之間的傳說、以及高帝以一布衣五載而成帝業的事實的社會組織的變遷的背景也是不會看清楚的。所以，偽史的出現即是真史的反映。我們破壞它，並不是要把它銷燬，只是把它的時代移後，使它脫離了所託的時代而與出現的時代相應而已。實在，這與其說是破壞，不如稱爲「移置」的適宜。一般人以爲偽的材料便可不要，這未免缺乏了歷史的觀念」。所以，我們從事這項工作的結果，就是要把真的材料放在一邊，偽的材料放在另一邊。這句話也許說得太簡單了，實際上真和僞往往是相對的而不是絕對的，不能這般地截然分開處理。拿古物來作比喻。宋政和、宣和間仿製了許多三代禮器，清康熙、乾隆間仿製了

許多宋代瓷器，他們的目的只是爲了愛好民族藝術的優良傳統而模倣，我們不可說它作僞。美帝偷走『北京人』的頭骨，我們博物館裏製了模型而陳列，這是爲了教育的需要，更非僞造。但是以前的古董商人確實成天在造僞，安陽的販子很多在真甲骨上刻了僞字，洛陽更設廠燒造古明器，它的形製反而比真的美觀。如果我們不管它杜撰的失實，只憑一時直覺的欣賞，徑把它們放在所託的時代，豈不是大大地攪亂了歷史的面貌。古籍方面正多相類的情形。尚書中的堯典和皋陶謨，開頭明寫着『曰若稽古』，自己早揭出了擬作；經師們卻解『稽古』爲『同天』，硬放到虞、夏時代。禮記中的大學，本是系統地貫穿了戰國以來儒家的精粹思想，作者並沒有假託於哪一古人；經師們卻又爲了崇拜它，硬把它分出經、傳來，說經出孔子而傳出曾子。這豈不是以不僞爲僞，我們怎能不辨！易經是一部奴隸社會的筮書，而竟有『不事王侯，高尚其志』的小地主隱居自怡的爻辭。論語是一部記載孔門言行的書，而竟有『邦君之妻』、『周有八士』等章和孔門毫無關係的話。我們怎能因爲它們大體是真書而對於這些地方就放過了！逸周書和越絕書同出漢人編集，當然很多漢人的作品，而其中的商誓、世俘和計倪內經諸篇實是漢以前的舊籍，我們怎能爲了多數的遲而忽略了少數的早！所以我們做這考辨的工作，決不能把古書截然分成真、僞兩部分而取真棄僞，而是要逐一決定它的時代，使後一時代的仿作和僞作不再混亂了前一時代的真相。我們不但不願毀掉一部書，並且不願損失一個字。

古籍考辨的工作已有長時期的歷史，在我國舊有學術裏比較富於科學性，是我們應當繼承的優秀遺產。這班古人的創造，萌芽於戰國、秦、漢而勃發於唐、宋、元、明，到了清代已瀕近於成熟的階段，這部分文化的發展過程是決不容割斷的歷史。在將來中國的新文化中，這一部分舊文化定將由於謹嚴的批判，吸收其精華而淘汰其糟粕，在這個基礎上正式建立起史料學來。

二十餘年前，我們曾在這個目的下編輯辨爲叢刊，分頭進行，或整理專書，或輯錄性質相類和時代相近的文字於一編，使得學人們易於看出這個趨勢。爲物質條件所限制，僅由樸社出版了十餘種。現在中華書局的同志們以爲這書可以做研究古書的入門工具和參考資料，要我繼續編輯付印，因此，便把舊稿檢出，校正誤字，改題爲古籍考辨叢刊。現在先出十種，作爲第一集，以後各集當陸續出版。等到散在羣書裏的辨論文字搜集略盡，我很想把前人研究的成果聯貫起來，寫成一冊中國古書年代的初步考定，作一個有系統的敘述。我們的工作是否得當，祈求同志們隨時加以嚴正的批評和指導！

顧頡剛。

序

疑古辨僞的風氣，通常以爲在兩宋是極盛的；至于漢、唐的時候，則多以爲辨僞的人畢竟是太少了，所辨的僞書也是很少。但是宋代辨僞的風氣何以如此之盛，那決不是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也必是以漸的。宋人的辨僞固然有一些其他的原因，而所受唐人辨僞的影響實在要算是一個很重要的原因；不然，則司馬光論風俗荀子所謂：

新進後生，口傳耳剽，讀易未識卦爻，已謂十翼非孔子之言；讀禮未知篇數，已謂周官爲闕國之書；讀詩未盡周南、召南，已謂毛、鄭爲章句之學；讀春秋未知十二公，已謂三傳可束之高閣。

陸務觀所謂：

唐及國初，學者不敢議孔安國、鄭康成，况聖人乎！自慶歷後，諸儒發明經旨，非前人所及；然排繁辭，毀周禮，疑孟子，譏書之胤征，顧命，黜詩之序，不難于議經，况傳、註乎！

在北宋的時候，辨僞之風忽然如是之盛，是很不容易解釋的。

原來唐人的辨僞，其風氣也是很可觀的。在國家頒布的五經正義之中，對於史記所載孔子刪詩

之說，認爲：

書傳所引之詩，見在者多，亡逸者少，則孔子所錄不容十分去九。馬遷言古詩三千餘篇，未可信也。（見本書，下同。）

對于尙書堯典、舜典則說：

虞史欲盛彰舜德，歸過前人。春秋史克以宣公比堯，辭頗增甚。

蠻夷猾夏，興兵犯邊。……唐堯之聖，協和萬邦，不應末年頓至于此。蓋少有其事，辭頗增甚。

對于周禮則說：

周禮大司徒云：『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一百里。』蓋是周室既衰，諸侯相并，自以爲國土寬大，皆違禮文，乃除去本經，妄爲說耳。

對于兩戴記則說：

大戴禮遺逸之書，文多假託，不立學官，世無傳者。其盛德篇云：『明堂外水名曰辟雍』，政穆篇稱『大學，明堂之東序』，皆後人所增，失于事實。

禮記是後世之言，不與經典合也。

月令秋其帝少昊者，……唯託記之耳。